

西南联大讲堂



闻一多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 闻一多 西南联大授课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西南联大讲堂



闻一多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 闻一多 西南联大授课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 / 闻一多讲述; 郑临川记录;  
徐希平整理.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9  
(西南联大讲堂)  
ISBN 978-7-200-10788-3

I. ①闻… II. ①闻… ②郑… ③徐… III. ①中国  
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0735 号

· 西南联大讲堂 ·

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

WEN YIDUO XINAN LIANDA SHOUKE LU

闻一多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16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0788-3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闻一多古代文学研究略论

徐希平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历史环境中，造就成长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诲人不倦；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令人难以超越的贡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特别是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古代神话等领域，有诸多开拓性、突破性的建树，使他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1947年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共四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闻一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这远远不是闻先生著述的全部，还有大量的著作散佚，大量手稿未及整理修订，让人十分惋惜，难怪郭沫若先生在《〈闻一多全集〉序言》中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

1985年，郑临川先生将保存多年的当年在西南联大聆听闻一多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第一段（先秦两汉）和唐诗研究的笔记加以整理，命名为《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为闻一多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闻一多全集》共12册，新收集整理遗著共4561千字，其具体分类如下：

第一册：诗

第二册：文艺评论·散文杂文

第三册：神话编·诗经编上

第四册：诗经编下

第五册：楚辞编·乐府诗编

第六册：唐诗编上

第七册：唐诗编中

第八册：唐诗编下

第九册：庄子编

第十册：文学史编·周易编·管子编·璞堂杂业编·语言文字编

第十一册：美术

第十二册：书信·日记·附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闻先生著述是何等的丰富，从

其分量来看，有关文化遗产的探索占了绝大部分，虽然其有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艰苦的治学条件，就不至于十分地求全责备了。这也正如傅璇琮先生在闻一多《唐诗杂论导读》中曾经讲过两段很精辟的话：

“我觉得，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如果只是扣住一些具体论点，与现在的说法作简单的对照，以此评论得失，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作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

时过几十年，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评价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闻先生研究初唐诗的角度以及他对这一阶段文学变迁审视的眼光，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闻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气度和魄力。”

闻一多先生对中国文化贡献巨大，创获甚多，取得了许多丰富而重要、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成果，体现出学术上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的创新意识和一丝不苟、严

谨治学的科学态度，体现出一种奉献与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比具体学术成果本身更重要。这也正是给后世以重要的启迪所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闻一多研究逐步深化，全国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从对其民主战士的确定，到重新认识其对于新诗的贡献，再到其对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关注，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却极不平衡，尤其是后者的认识和研究，任务最为繁重和艰巨，这不但由于闻一多对此用功最深、成果最丰，也还因为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功底，需要对各相关专题学术研究史的熟悉和了解，才能看到闻一多先生的继承与发展，评价其学术贡献，因此，这至今仍为闻一多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曾与罗庸、浦江清先生一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课，示范性地指导学生如何进行研究，深受欢迎。闻先生讲授的先秦两汉文学段，已由郑临川先生记录整理，收入《闻一多论古典文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罗庸先生讲授的中古文学、唐宋文学研究记录稿，则由郑先生精心珍藏半个多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面世。笔者受郑先生重托，将闻、罗二师讲授稿重新校订，合编成《笳吹弦诵传薪录》一书，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当年罗庸先生为西南联大所作校歌曾广为传唱，歌词《满江红》中有“正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一句，高度概括了抗日战争烽火中联大师生在西南边城昆明的生活与情怀：为祖国育英才，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故书名特取其义，以激励后学，纪念先哲，传承学术精神。

整理该书是郑临川先生晚年的一大夙愿，该书即将问世前，八十六岁高龄的郑先生不顾体弱多病，亲笔写下前言，对二位大师的教学风格作了简洁的分析：

“闻、罗两师讲课的语言风格和论述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独到的显著特色，而授课的旨趣却是一致的。即不限于一般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而重在开拓学生的读书视野和深远思路，教他们在饱饫熏习前贤丰厚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能逐步深入古代历史环境，理清作家创作的上下关联和时代网络，透视他们成就高下得失的关键所在，辨明个性与共性的紧密关系，从而产生实感与谅解，缩短古今历史距离，得与百代精英的心灵长河通流，在自己研究中作出客观评价，由此走向继承发展，探索前进的道路。根据个人学习终身受益的体会，感到全部讲稿内容，对启迪文学史研究方法、提高品鉴古代作家作品的识见，都有入门的指导作用，相信它的受惠者当不止于及门弟子，亦可普及沾溉更多后学，为了弘扬师

法，故推荐问世。罗庸先生著述不多，身后寂寞，故此书问世甚为难得，弥足珍贵，亦可沾溉后学，为促进学术提供有益的启迪。”

也正出于弘扬前辈学术文化优良传统的目的和愿望，自2003年开始，笔者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中国教育家研究系列——闻一多研究》选修课，扼要地介绍了闻一多先生的诗人、学者、斗士生涯，重点介绍其学术成就和贡献。在讲授过程中，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思索，对临川师所论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对闻一多先生治学精神也较过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当然，限于学识和水平，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还是不揣冒昧地谈出自己的理解，以求学术精进。

综合探讨闻一多先生的治学道路，不难发现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色，而且在今天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 1. 目的明确，彰往察来

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古代文化是什么态度，这常常是摆在学者面前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往往有两极分化的态度，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全盘抛弃，全盘否定；一种是泥古不化，倡导复古，或者单纯为学术而学术。均不可取。闻一多与鲁迅一样是古文献学、古代文学大师，但他潜得深，也钻得出。鲁迅“反戈一击”，闻一多“里应外合”，目的是思想革命，探索

未来文学发展的道路。

因此，郭沫若指出：

“闻一多搞中文（国文）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为着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sup>①</sup>

闻一多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我酷爱我们祖国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东西，正是为了这，我在那故纸堆里钻了很久很久，古董销蚀了我多少生命！我总算摸清了一点底细，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糟粕，我总算认识了那些反动糟粕的毒害。而这些货色，正是那些人要提倡的东西。”

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书中的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sup>②</sup>

“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由此可见，面对“五四”之后文化界否定一切传统文化之风潮，闻一多保持清醒的认识，批判之前必须先认识，否则不能击中要害。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分清精华与糟粕，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也正是文化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不解决，将直接影响研究的性质、观点和质量。彰往察来，传承民族文化，并为后世文化发展提供借鉴，认识到这神圣而重大的职责，也就可尽力减少或防止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浅尝辄止、主观武断等弊端，为各种不良学风打上一剂预防针。其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 2. 求真务实，勇于开拓创新

季镇淮先生曾指出闻一多“研究气派是富于自信心和创造性的。他不甘心跟在前人后面走熟路，吃现成饭，而总要独辟蹊径，自我作古，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并由此逐步深入，直探本源，以求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但他在学术问题上，又始终是实事求是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sup>③</sup>。这里强调指出闻先生和西南联大老一辈学者所具有的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无论是唐诗研究还是诗经、楚辞、神话、庄子等先秦文学研究，闻一多先生都提出许多新的创获，虽然其中有的观点仅为一家之言，也已能够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其中相当多的论断也已为当代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反复征引，津津乐道。还有不少则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启迪和努力的方向。这其中许多皆为开创性的工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先秦两汉

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出版）中提到闻先生在各个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者比比皆是。以全唐诗研究为例，如当代学者所评：

“真正认识到《全唐诗》的缺陷并着手对它进行全面整理的，闻一多是第一人。”<sup>④</sup>“他已经洞察到《全唐诗》遗佚甚多，底本未善，重收、误收等诸多重大遗憾，对它的整理工作也有了通盘周密的考虑。”<sup>⑤</sup>其研究成果和目录“说明闻氏的《全唐诗》研究广泛涉足了每一个重要领域，已将唐诗文献中辑佚、辨伪、辨重、校勘、注释等结合起来，将作品考订与作家生平事迹与交游考证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研究格局”<sup>⑥</sup>。

“闻先生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唐诗，有点像‘四杰’处于唐诗发展初期，是创业拓荒阶段，粗率在所难免，因此被一般正统学者讥讽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自无足怪，但仍然不失其为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首创之作。”

闻一多与信奉儒家求仁力行之说，强调“为己”之学的罗庸先生一样，为学不求虚名，不为世俗浮华所诱动，重在切实致用，解决具体疑难和实际学术问题，此亦为当年西南联大时期大批老一辈学者共同的鲜明特点和优良传统，陈寅恪先生也正是由此出发，大力倡导独立的学术品格和精神，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 3. 文体进化，新陈代谢

文体盛衰，新陈代谢，不断更新，向前发展，这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国文学绵延数千年，多以传统诗文即所谓“文”“笔”为文体之正宗，其内部又有若干体制，如诗之古近体、五七言、律绝，文之书序启状、碑志诔铭，种类繁多，各有法则，按《文选》即可分为39大类，而诗文之外，体裁更是丰富多彩，小说、戏剧、各类民间通俗文学，不胜枚举，后者的出现和实际成就还使得诗文独尊、独霸文坛的局面得以产生巨大的改变，取而代之，推动和影响后世文学的持续发展。传统诗文和各类新兴文体有一个交替共荣的转换阶段。

闻先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就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来看，他认为唐诗成就超越前代的原因就是这样。他说：

“屈原以后，下迄东汉，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的暗淡时期。其实，从另一方面看，这时期的人真能实干，都在努力从事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精神绝不麻木。自王莽酿成大的政治失败，以至魏晋时代，诗文大盛，而人的良心便不可问了。直到唐初才渐有起色，诗歌由写自然进为写天道，再进为写人事，这就形成了杜甫这一派。我们总括这大段时期文学发展的情况，是否可以这样说：两汉时期文人是良心而没有文学，魏晋六朝则

有文学而没有良心，盛唐时期可说是文学与良心兼备，杜甫便是代表，他的伟大也在这里。”

“诗的发展趋势，往往是由质朴走向绮靡，这也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我们既须承认事实；又须求其平衡，唯有大作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展到成年了，以后似乎不大肯长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中国文学向前发展的方向，为新时期各种新的文学体裁创作发展指出了辉煌前景，也提供了可信的理论根据。

#### 4. 竟委穷源，论从史出

关于新陈代谢的具体过程，闻一多和罗庸先生也有相近的精辟之论。罗庸先生认为新体裁的源头主要来自民间与少数民族。“生命体之来源何在？一体文学既旧，新体何由产生？余以为凡二来源：1. 来自民间，2. 来自外族。持此可打破历史上毫无依傍之天才创作之迷信。如《诗经》灭而楚辞兴，楚在当时为南夷，由此而有汉赋；再四言既敝，五言代起，此难缘于乐府，乐府实民间之产物也；五七言既敝，则词发生，词缘于大曲，曲为西域之乐，又为来自西域之明证也。”<sup>①</sup>

闻一多先生从新诗创作实践中初步认识到地方色彩的重要意义，主张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特质；再从唐诗研究中探索出中华民族文学的两种主要特质，即关

心社稷民生的写作内容和陶冶性情的写作效验。由此追根上溯到先秦典籍、上古民谣神话，其质朴健康的民情风俗，原始强大的生命活力，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素质和中华民族文学特质的真正源头。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歌舞艺术更使闻一多先生看到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广泛前景和创新途径。闻一多先生在长期实践和探索中形成的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文学观，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闻先生在先秦古籍《三百篇》《楚辞》等作品中，发现我们民族古代的民情民俗是质朴健康的，如《说鱼》一文里考证出鱼在古代是象征配偶，原来在原始人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的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唯一目的。种族繁殖既如此地被重视，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年轻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

朱自清先生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故事等，也为了探索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

闻一多在1938年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指导采风活动中

受到启发，从那些“原始”“野蛮”的民族歌谣中看出了中华民族的强旺生命活力，还潜伏有那种“困兽犹斗”的狰狞动物本能，“保证了我们不是天阉”，这种大有可为的潜力还保存在当今少数民族之中，正好用来医好我们这些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白脸斯文人”，1946年5月19日在昆明看了圭山彝族音乐、舞蹈的演出，更加强了这一信念。

### 5. 实事求是，一丝不苟

与论从史出相关联，闻一多先生特别注重原始文献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辨析，为研究提供尽可能真实的依据。闻一多曾反复强调文献整理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辨伪，明确提出“从未有人怀疑过诗经的真实性。孔子删诗也是一个作伪。动了笔，就不仅删，还有改”。“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百篇》，尤其是二《南》十三《风》，决不是原来的面目。”

针对《楚辞》研究阅读的难点，闻先生《楚辞校补·引言》给自己提出三大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在最基础性的工作——校正文字上，其中如《楚辞校补》主要是“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同时也“尽量将第二项——诠释